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五〇期 ——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508d)

---

【回眸历史】关于“文革”前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始末	散 木
【当事者言】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阎明复
【人物春秋】戚本禹沉浮录	霞 飞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回眸历史】

关于“文革”前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始末

• 散 木 •

### 一、共和国前十七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

自从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民主革命的迅速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随即到来，作为胜利之源和法宝的毛泽东的著作与发行也成为了相关部门的重要日常工作。此后，又随着毛泽东本人威望的日益提高以及不断加码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运动，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发行更成为了中国出版业最重要的工作与内容。客观地说，它对推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但它也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潮流中起了十分特殊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基于“神化”的需要，不顾实情，过多过滥地出版和发行毛泽东的著作，进而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浪费，并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一块特殊的印记。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毛泽东的著作开始逐年陆续大量出版和扩大发行，而且随着“反修”形势的发展，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还有了许多翻译版本。此前新中国成立时，已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种外文文本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当时一些新中国出版的外文期刊也及时刊登毛泽东的著作，如英文版《人民中国》于1950年刊登的《斯大林是中国

人民的朋友》《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此后，外文出版社开始用英、法、俄、德、西、日、乌尔都、荷、芬、阿拉伯、越、泰、缅、印尼、印地、世界语等多种文字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毛泽东诗词》等著作（总计17年共先后用18种文字出版了毛泽东著作447种共1108万册，并通过国际书店向全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394万册，对外赠送和国内发行则有330万册）。进入50年代后期，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中，《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小册子也通过国际书店等被大量运往国外发行，其中有的遭到一些国家的查封。继之，又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演化，特别是出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需要，60年代初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列宁有关的著作如《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等小册子也被大量陈列在各地的书店和机场、车站、旅馆、书亭等处，甚至免费赠送给外宾，以至于有的“修正主义”国家为此提出抗议，如当时的“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就我国际书店寄发《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等6本小册子提出抗议，对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指示说：这是“无理纠缠”，应“不予置理”云云。但这还不是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剑拔弩张的时候，对外宣传也还要讲究策略，如陈毅就曾对此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打通人家的思想，要使人如坐在春风之中，讲道德、说仁义，很好听，很温暖。”“中国革命家谈问题，要使人感到我们不是蛮横的，很可以谈得来，至于他改不改，不要蛮来。”当时分管外交的陈毅还评价已被翻译成各种外文译本的毛泽东著作：“现在翻译的《毛泽东选集》，还是英文的水平最高，俄文次之，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又次之，日文还不错。”（1963年7月25日《在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所说的日文翻译本，陈毅说是“日文有专家”，后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还邀请了日共《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来华协助工作，这些都证明中央以及有关方面对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工作一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的。显然，在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又一个热潮中，出版和发行毛泽东著作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于是，不可避免的则是毛泽东逐渐走上“神坛”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中间，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始发迹的林彪起了推波助澜的特殊作用。原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一向不喜称“主席”，也不喜呼喊“万岁”和唱《东方红》，他还在一次出访东欧之后更加担忧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革命时期最大危险是右倾，对敌妥协，取得政权后则是左倾、官僚主义”，特别是在访问了东欧和蒙古等八国后，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以及到处呼“万岁”和搞特权，为此，彭德怀更加致力于抵制“个人崇拜”，却最终在“庐山会议”上铩羽。林彪取代彭德怀之后，开始在解放军中不断制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同时又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功利化，这期间最有影响的则是由他组织编辑并由他撰写序言的《毛主席语录》的出版。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它开始时是作为军队内部发行的，后来改为在全国公开发行，随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经过有所选择、有所突出的“语录体”本子，加上林彪宣扬的“立竿见影”“急用先学”等等，毛泽东思想日益被片面化、教条化、庸俗化了。

## 二、“文革”中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狂潮

到1966年1月时，当时已有三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即解放军“总政”、人民出版社（中宣部与文化部、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专人选编而成）、《红旗》杂志社（陈伯达组织选编而成）的三种，后经邓小平、彭真等在钓鱼台会议上决定：以人民出版社的《毛主席语录》本为基础进行修定。此后，在“文革”的“山雨欲来”之际，《毛主席语录》已经成为一本《圣经》似的出版物，它不仅成为国内广大读者在那一特殊的政治运动的时期最需要的书，甚至也为一些在华外国人急切所需。这年6月，国务院“外办”发出《关于外国人索要〈毛主席语录〉的通知》，指示可以满足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常驻外宾要求赠阅、借阅、购买《毛主席语录》的需求，只是“对方没有索要的，不主动散发”（此前规定不向外国人赠送，且凡赠送的都要收回，因为《毛主席语录》是“内部读物”）。到了1967年2月，“外办”又发出通知，认

为此前发出的有关外国人索要《毛主席语录》的通知是错误的，且均予撤消，因为它们“不符合主动积极地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而“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出通知：“对外赠送毛主席照片，只要是新华社公开发表的，均可对国外读者赠送。”

在满足外国人需求《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像片的同时，更加要“满足”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著作的“渴求”，鉴于此前《毛泽东选集》的供需一直处于紧张状态，1966年初有关方面估计：当前至少需要1100万部以上的《毛泽东选集》才能缓解需求。1966年2月，中共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所做的请示报告，即考虑到要在本年内重印相当于过去15年总印数的《毛泽东选集》，因纸张供应、印刷能力不敷，只能分批予以满足，因而本年只能重印500万部。此后，文化部发出《毛泽东选集》发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将之作为头等重大的政治任务，首先要满足重点读者对象，则《毛泽东选集》的合订本、普及本基本上通过机关、团体等单位来分配。同时，军委总政治部编辑的《毛主席语录》的纸型也经中央同意分发各地，并且全国已赶印达2800万余册，但仍供不应求。实际上，以上印刷和发行的数字已经相当可观了，所以当时的文化部报请中宣部：考虑到毛泽东著作的发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的，且为公费支付，免费分发，容易产生重复供应而造成浪费，建议交新华书店控制发行，同时不要在报纸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等。

但是到了这年6月，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也即“文革”正式开始），早就被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并且已经免去齐燕铭、夏衍等的领导职务）文化部却又报请中央要求加速印制毛泽东著作了。所谓“加速”，即两年内计划印制《毛泽东选集》共4卷2300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2800万部和乙种本5200万部、《毛主席语录》2亿册。显然，这是当时中国的印刷业极其重大的任务，甚至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又决定“打破过去指定少数印刷厂包印的老框框，全国凡是有一定条件可以印毛主席著作的印刷厂都可以承担印制任务”；“一般新书凡不应出或可出不可出的，坚决不出”“再版的暂时一律不印”“一般刊物或性质相近的可加以合并”，或“减少篇幅”“延长刊期”“暂停出版”等，即“要把一切可以用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纸张全部拿出来印制毛主席著作”。7月，文化部又迅即召开“毛主席著作印制工作会议”，决定拟在两年内增加《毛泽东选集》印制700万部，后又经与会者讨论，在此基础上再增加500万部，即两年共印制3500万部。随后，为“满足”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要求，文化部根据已经改组后的中宣部的部长陶铸的要求，报请将《毛泽东选集》普及本实行降价，从原来每部的3.25元减为2元，亏本由财政部补贴。8月，一机部召开印刷机械行业的紧急会议，要求全力保证《毛泽东选集》的印制，即“需要多少就造多少，要什么品种就造什么品种，要动员群众，大力赶制，保证提前完成，总之，要包下来，以敞开供应《毛泽东选集》为目标”。当时承印《毛泽东选集》用纸的金城造纸厂党委还致信文化部：“为了使最高指示不出一字一点的政治差错，职工们提出要把纸病尘埃当成‘黑帮’一样去消灭，保证出好纸，多出纸。”一机部也决定增拨纸袋纸750吨，专供新华书店包装《毛泽东选集》所用。

以上所说的“黑帮”，就是指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当时它们与旧北京市委并称为“三旧”）的领导。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之后，中宣部也进行了改组，陆定一被罢官，改由陶铸任部长，陈伯达担任顾问（仍挂中宣部副部长头衔），随即又开始了批判旧文化部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的斗争，而“反对和压制出版毛主席著作”便是周扬的一条“重要罪行”。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文化部出版局造反派的大批判文章《控诉周扬阻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罪行》，指称其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挠《毛泽东选集》的大量印行，致使很多工农兵群众买不到《毛泽东选集》，文章揭发周扬曾说过：“《毛泽东选集》印得已经不少了，已经印了九百万套了。”他还说：“有多少人从头到尾读过《毛泽东选集》值得怀疑，为什么只能读少数几篇文章

的人，一定要买一整套《毛泽东选集》呢？”文章还统计说：1962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只占全年出版书籍的0.5%。而当时几部古典小说如《红楼梦》等的重印用纸竟达7500吨（用于毛著出版只有70吨）。8月，中共中央做出“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立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民日报》则发表《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的社论，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巨大胜利”。

为了完成两年印制《毛泽东选集》3500万部及大量《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等毛泽东著作“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新改组后的文化部向全国出版部门发出了特急通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及所属单位除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画像的出版、印刷、发行之外，其他业务基本陷于停顿，不仅一般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图书向毛泽东著作的出版让位，甚至科技书刊也受到了冲击。接着，中央有关部门对毛泽东著作的定价、税收、运输以及纸张供应、银行贷款等等也采取了优惠措施，即交通运输部门要做到优先运送，并且一律免收托运或邮寄毛泽东著作的运费、装卸费、邮递费（至1969年5月方恢复收费）等，也不征收有关税收，银行供应的有关资金免计利息，《毛泽东选集》所用凸版纸的出厂价予以降低等，以此表示对中央决定的拥护和支持。

此后，在“文革”造成的“个人崇拜”的新一轮高潮中，上述印制数字又迅速被打破了。1966年底，文化部党委向中央写报告请示说：根据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1967年全国印制《毛泽东选集》的计划可达8000万部！但因为纸张的缺乏，只能落实到6000万部，随即当时中央有关方面立即予以协调，争取完成并超过计划数目。到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各界群众大会上宣布：本年印制《毛泽东选集》将达8000万部！不久，《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北京、上海22个群众组织的联合宣言，题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担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政治任务》，同时又发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短评：《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它们热烈赞扬“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然而，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许多地区的出版、印刷部门纷纷被“造反派”夺了权，完成印制《毛泽东选集》的任务自然受到了影响，有鉴于此，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颜金生、赵辛初立即代表文化部党委（部长萧望东和石西民等几位副部长大多已被“造反派”揪走）向康生汇报，但康生以事忙无暇为由，嘱向“文革小组”的王力请示，王力也避而不答，显然，夺权的红色风暴冲击了一切正常的秩序，谁也不敢保证《毛泽东选集》印制会如期完成。如果届时没有完成，那当然会是一个不小的责任甚至是“罪行”。1月26日晚上，江青、陈伯达和王力等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几个“造反”群众组织的头头，当上海出版系统的“造反”代表在汇报中说到轻工业部把做鞋底的塑料放在第一位，却把印《毛泽东选集》用的塑料放在第六位，因而要造轻工业部的反时，江青答腔说：“这个反应应该造。”会后，轻工业部便被“造反”了。不久，因各地“造反”使得出版工作陷于停顿，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成立了一个“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随即派员分赴各地了解《毛泽东选集》印制计划的执行情况，调查所得的结果是：由于大部分地区原有的出版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新的领导机构尚未建立，《毛泽东选集》的印制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有的地区虽然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有的地方实行了军管，但也大多忙于运动，难以顾及《毛泽东选集》的印制工作。鉴于这种情况，这年7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央文件，决定“对几个重要的造纸厂（如汉阳、宜宾、江西等造纸厂）即由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并“严格控制各高等院校小报发行数量”，随即许多地区开始先后建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或类似的机构，先前瘫痪的局面才得以逐步恢复。到了这年底，果然《毛泽东选集》8000万部的计划被提前超额完成。据当时的统计，1967年全年实际完成印制《毛泽东选集》9211万部、印制《毛主席语录》3.7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4791万册，其他单篇本等也有数亿册。又自1969年2月起，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出版毛泽东的语录、诗词和其他五篇著作的合订本；此后1970年9月，在将出版的《红旗》第10期上发表有《认

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一文，其中提到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后来也被汇编为《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出版而广为印刷发行（除了毛泽东的著作，“文革”中还大量印刷出版了马列主义的一些书籍，如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提出学习马列的6本书：《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6本书遂开始被大量印刷）。

此外，为加强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除原来设立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翻译出版规划五人小组”（由中宣部副部长熊复、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文局局长罗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五人组成）之外，又成立了外文图书出版社所属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室，它先后设立了17个语文组（英、日、法、西、俄、越、缅、印尼、泰、阿拉伯、德、世界语、朝、乌尔都、斯瓦希里、波斯、葡萄牙等，后又增加了新蒙古文、豪萨文、意大利文、阿尔巴尼亚文、芬兰文、挪威文、罗马尼亚文、希腊文、土耳其文、泰米尔文、尼泊尔文、老挝文以及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文种）和一个质疑组，由其翻译相继出版了各种文字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及《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等，其中《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也达到数百万册。1976年，在中宣部指示下还成立了一个由文化部和外文局联合组成的16种文字的《毛主席诗词》翻译班子，这是一个调集了各方面翻译力量的翻译机构，其中既有诗人，也有翻译家，有文学工作者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也有外国专家，其中有袁水拍，又如钱钟书等，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还走访了郭沫若、茅盾、胡愈之、赵朴初、臧克家、王力、冯至、郭化若等，后来除出版了日文版的42首本之外，其余各文种均出版了39首本（此前的1959年出版有19首本）。其中英文版有特种精装甲种本、乙种本和普及精装本、平装本等。此前的1967年，毛泽东著作的外文版在国外发行总计已达565万余册，达到历年其著作在国外发行数量最高的年份。不过，由于发行量过大，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如非洲某国一家小书店向中国国际书店订购了50本《毛主席语录》，国际书店主动寄去500本，结果多余的被长期积压在该国海关，书店却要支付海关仓库的保管费，影响非常不好。有的国家和地区也因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对立，开始封锁毛泽东著作的进口，于是为了使毛泽东思想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些国家和地区左派势力的书店拟采取伪装封面等方法强行运销毛泽东的著作，对此，周恩来在一个批示说：“不能同意。”

在毛泽东著作大量出版和发行的同时，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毛泽东著作中所提到过的那些已被打倒的人物。1967年3月，陈伯达、康生等向林彪、周恩来等写信，汇报向毛泽东请示修改《毛泽东选集》注释（即《毛泽东选集》中的刘少奇等人名等）的问题，毛泽东在指示说：1．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3．《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掉。4．新印版本仍用原来的出版年月日期。5．《毛泽东选集》的五、六卷，一年以后再说。6．《毛主席语录》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可删去，第24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既承认历史又有所变通，其实是暧昧地认可在自己的著作中可以删去一些文字的，循此，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办公室通知人民出版社：在《毛泽东选集》中删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有关刘少奇的一段话。就在《毛泽东选集》被大量印制时，这年末，中央文革小组的宣传联络员还多次通知“毛著出版办公室”，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即紧急布置出版《刘少奇修正主义言论集》，发给有关部队、机关和红卫兵组织中有批判能力的人，作为内部发行，所用纸也要取差一些的、封面深灰色的，共印3万部。与此同时，却又要出版《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并拟在北京印200万册，各地发纸型。

刘少奇等被新版《毛泽东选集》“除名”后，此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有林彪像的照片也被封禁和禁销，有关书籍也被查禁（如周赤萍等的回忆录），于是印有其题词、前言

的《毛主席语录》也被要求进行技术处理。至于毛泽东著作中林彪的处理，1975年8月经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做出如下处理办法：1.《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三文注释中删除林彪，保留朱德、陈毅的名字，以恢复历史真相；2.《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注释中保留林彪的名字，因系引述中央文件，不宜也不必改动。

除毛泽东著作的狂热印制之外，“文革”中更为狂热的是毛泽东像片的印制。在“文革”前的17年中，毛泽东像总共印了1600多万张，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计划印制发行毛泽东标准像2亿张、生活像1亿张，但仍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于是拟再印制对开张标准像2.5亿张（自然张可达5亿张以上）。当时还为了保证印制质量，文化部限定将之都集中在京、沪两地印制。“文革”全面升温后，各地和各方面要求大量供应毛泽东的像片和画像，以至于文化部估计其原来安排印制的数量仅能供应京、沪两地的需要，其他各省、市可能会脱销。于是文化部党委紧急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提出印制毛泽东像的改进措施，即全国各地凡具备印制条件的印刷厂均可印制毛泽东像；像的底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统一供应。文化部在报告还说：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已向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毛主席像不准卖钱，最低限度只能收取成本费”，并要求限期答复；天津及其他城市也有同样要求。鉴于《毛泽东选集》普及本的定价已经降低（1966、1967年两年降价造成的亏损4300万元，由国家财政部门解决），报告建议将毛泽东像的定价也降低一半，其在当年造成减少的1000万元的收入由财政部门解决。在中宣部批准了文化部的报告后，从1966年7月至1967年5月底的11个月内，全国就印制了毛泽东像33个品种，总印数达8.4亿多张。此外，1967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摄影展览，人民美术出版社迅速将其中的60幅照片印成12开本画册，于7月1日起大量发行，加上其他出版的多种多样的毛泽东像册，则其印数也可高达数百万册。至于“文革”中有关毛泽东画像中最有影响的，则是那幅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1968年6月，江青对这幅送审的油画大加赞扬，称其“非常好，把主席的神气都画出来了”；又说：“这幅油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实之一”。随后的7月1日，《人民日报》随报向读者赠送了这幅彩色的油画，许多省市的报纸也纷纷相仿随报赠送之，当时“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也向全国做了紧急安排，分别出版了4开和8开的画像，并由空军派出的飞机将印版运至各地开印，截至1969年底，这幅油画共印制了1.913亿张。

与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同样，印刷和出版毛泽东的像也时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如1968年4月“毛著出版办公室”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群众反映，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彩色像中，毛头发的纹路里有“修党”的字样。后经办公室人员赶赴新华社、人民日报对这张像从原始照片到出售的彩色像的各修改版样进行对照分析，结果却是毫无根据的，原来是虚惊一场。

与此同时，有关毛泽东的像章、语录章也被大量制作和出售。仅1967年这一年，中国国际书店对外出口毛泽东像章、语录章就达50余种共557万枚，并被发行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港、澳最多。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67年至1969年第一季度，中国国际书店通过贸易方式出口毛泽东像章680万枚、通过非贸易渠道赠送40万枚（参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新星出版社1999年版）。此外，外文局还印制了一批外文的《毛主席语录》标语，用15种语文出版，准备大量供应国外，后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停止出版。后来，毛泽东又在一个关于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求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之后，他又在一个关于群众在与外宾接触时可赠送对方毛泽东像章的报告上批示：“不要。”

### 三、狂潮中的反拨

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发行是新中国出版业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从1949年10月1日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9年12月，全国共出版图书（包括书籍、课本、图片）2028436种，总印数1861.39亿册（张），其中从1951年到1966年“文革”前，四卷“红宝书”已累计出版发行了1000万部，此外单行本合65种也已印了15000万余册，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也已印了7500万部；到了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共出版图书91869种，总印数300.17亿册（张），而在这300.17亿册（张）的数字内，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单张语录和诗词就达108亿册（张）之多，其中仅1966年就印行《毛泽东选集》2416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两种版本则分别为2867万册和6449万册、《毛主席语录》达2346.7万册，其他专集、汇编本、单篇本共74814.8万册以及单张语录等31090万张、诗词手迹224万张、像37910.5万张；1967年又共印行《毛泽东选集》9211万部（其中精装合订本60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两种版本分别为1914万册和2877万册、《毛主席语录》则达到3.7亿册，其他专集、汇编本、单篇本则近8亿册以及诗词手迹7060万张、单张语录等近4.5亿张、像12亿张。总计自1966年至1976年末的“文革”期间，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汉文、8种少数民族文字、盲文、36种外文共46种文字）达42.06亿册（其中《毛泽东选集》普及本6.9亿册，合订本5400万册，《毛主席语录》10.53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及其他各种汇编本、单篇本24.09亿册），毛泽东像和单张语录达62.27亿张。其中，毛泽东著作的外文版，自1949年10月至1968年底，《毛泽东选集》已出版有8种文字，《毛泽东著作选读》有2种文字，其他不计，至1966年5月共出版有1075万册；再至1968年3月，又出版有2513万册，发行范围则遍及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又多系赠送。又据统计：外文局从1966年6月至1971年8月，共用36种文字出版毛泽东著作已达1.1亿册，其中《毛泽东选集》共4卷是11种文版，《毛主席语录》已出36种外文版，《毛泽东军事文选》是11种文版，《毛泽东著作选读》2个文版，其他汇编本、单行本不计。

以上数字还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如果加上“文革”期间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群众组织编印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其数量更加惊人。这是我国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那真是毛泽东的著作做到了人手一册甚至人手数册，当然这还不包括大量群众组织自行印制的各种毛著版本。关于后者，中共中央于1967年5月至1969年12月曾先后8次发出通知，指出：“各地许多群众组织非法将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信件、诗词、批示、照片等汇编成册大量翻印；有的红卫兵组织将抄家得到的中央领导的内部讲话、机密文件等大量内部材料汇编成册，广为流传；甚至有的工厂红卫兵组织将传抄来的有关中央负责同志对国防科研的内部讲话、报告、批示等收入汇编的小册子中，严重泄露了我国国防科研机密。中央要求各地严禁这类非法印刷品，采取措施，立即收回销毁；并要求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以杜绝擅印未经批准的文件和资料。”1971年6月，周恩来指示编印出《经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录》（未收入军内发行的版本），以此作为清理非法印刷品的依据。关于像章，1969年6月中央也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今后印制毛主席像的有毛主席形象的宣传画，必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认真讨论和批准。”“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禁止用毛主席像章在街头进行交换。”“中央、地方和军内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车辆、机器、武装装备、信封、信纸、办公用品、生活用品、文具、儿童玩具以及各种商品、商标、包装上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的活动。”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因林彪曾提出过所谓的“四个伟大”，有关方面遂决定今后毛主席标准像不用像题、凡印有“四个伟大”的一律作技术处理或以保密件送纸厂化浆。

鉴于大量印制毛泽东著作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曾多次顶住压力予以批评。1969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国民经济计划首先要高质量全力保证《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但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现在城里的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像章百余枚，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我看应该要求来一个献像章、献语录的群众运动。他还认为本年的“计划纲要”拟印《毛主席语录》3亿册是否多了，认为可以少印一些，节约纸张去搞别的，《毛主席语录》可从城市捐献给农村。12月，周恩来又在全国机电工作会议上指示：“毛主席像是珍品，多了就不珍贵了，不要印得那么多。”此后过量出版毛著、毛像的势头有所控制，这年9月，中央批准“毛著出版办公室”的报告，要求少量出版《毛泽东选集》横排大字本。

周恩来上述讲话中所指的“去搞别的”，当时最突出的就是学生手中严重缺乏字典。1970年5月，全国小学开学后要求供应字典的呼声甚为强烈，当时出版社拟修订再版《新华字典》《四角号码词典》，负责出版工作的陈伯达答复可以出版《新华字典》，但《四角号码词典》是王云五搞的，暂时不考虑再版。随后有关方面开始组织人力审读《新华字典》，而审读的结果也令人啼笑皆非，如在汇报中认为此书“收录了一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早已在人民生活中死去的生僻字（如“陛下”“太监”“僧侣”等，修订小组拟尽数删除之——笔者注），而对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最常见的重要词语，如‘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却没有收录。它在一些注释、举例中塞进了封、资、修的黑货，宣扬或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又如“毒”字下的例句，有“太阳很毒”等等，皆属大逆不道。不过，鉴于尚无一本新字典可以取代之，考虑到它收字较多、字形注音比较准确、字义解释还有可取之处，遂拟将存书70万册附一“致读者”的条子有组织地按成本发行，以“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地使用，请他们在批判地使用过程中对编写新的字典提出意见”。此后，周恩来针对学生无字典可用、青年人无书可读的出版问题进一步提出意见，他批评了陈伯达因《四角号码词典》系王云五所编而废之的观点，认为“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而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他还指示修订小组不必删除所谓的“生僻字”，因为“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字（词）仍要用。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不能主观，有些知识还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历史，历史上的一些事物应该介绍的，不要回避”“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这样，《新华字典》（试用本）遂较顺利地修订后于1971年6月正式出版了，这是“文革”后首次出版的字典，当年征订数即高达8482万册，笔者当年正读“戴帽中学”，就曾侥幸购得一册。

也是早在林彪事件之前的1970年9月，周恩来又指示说：在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上所刊登的一条林彪语录不妥，这条语录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周恩来传达说：毛主席多次提出这条语录不要用，于是他指示“以后《参考资料》上不要用语录了”。此外，他还就收入这条语录的解放军政治院所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指示：“中央已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哪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他还要李德生负责此事。此后查出有种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440种，大多数是“文革”高潮的1966年至1969年所编印的，其中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半数以上，其余是由各省、市“革委会”及部队、机关、学校等所编印的，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泄露机密、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语录不准确、有的将大字报等流传的材料也作为了“最高指示”，至于内容编排不当、讹误错漏等更是不胜枚举。

#### 四、狂潮退去之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正式出版，此书收入了毛泽东建国以后至1957年11月的著作和讲话70篇，印数达2.2亿册。1977年也正是中国恢



复高考的第一年，当年报名又准予参加高考的考生多达570多万（报名者更多达1000万余人），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已使得资源严重匮乏，考试用纸入不敷出，最后由邓小平拍板，断然决定暂时搁置《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印刷，调配相关纸张先用于印刷考试试卷，方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后，其英文版也于这年9月开始向全世界发行，到年底又出版了其他4种外文的文本，并向12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17万余册。此后1982年4月中宣部通知国家出版局：因该书有些提法（包括出版说明和注释）不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决定予以停售。9月，外文局建议在新出的《毛主席诗词》中删除《为李进同志拍摄庐山仙人洞照》，因为“李进”就是江青，或者将该诗的题目改为《庐山仙人洞》，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的吴冷西、贾步彬联名向中央建议：“可以援引毛主席在世时批准在《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中删去刘少奇名字的原则，删去‘为李进同志所摄’似较妥当。”这个建议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所采纳。

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通知说：“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断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同年12月，国家出版局向中宣部上报《关于解决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积压问题的请示报告》，内称全国积压此类书籍多达4.5亿册（占全部存书量的27%），合码价1亿余元，且因长期积压要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从1979年起，每年要付银行贷款利息400余万元，以及长期占用书店库房等，许多书籍已出现封面粘连、书脊脱胶、钉锈而成为废品，因此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中宣部对此要求予以妥善处理，尽可能使存书发挥作用。此后外文局也批准了中国国际书店分别情况处理库存过多的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这些过量的书籍主要是指一些单篇本和小册子，当时已超量积压33种总计3600万册，后销毁处理了2661万册。

至此，作为“精神原子弹”和“个人崇拜”运动产物的过量的毛泽东著作的出版，逐渐停息了下来。一个时代也随之宣告结束了。现在，在全国的许多旧书市场上，旧版毛泽东著作已经成为“奇货可居”的收藏品，只有在那里人们还能依稀联想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同时，作为世界出版史上印刷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当年毛泽东著作出版的狂潮，却依然还能让人们为之百感交加、不胜唏嘘。

（本文中的数据参考了新华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以及发表于《湘潮》2000年第12期方厚枢的《文革中印刷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108亿册（张）》一文，特此说明）

□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1

~~~~~

# 【当事者言】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 阎明复 •

其实，我并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况，只能说是通过工作关系“有所接触”而已。本文我打算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使大家从不同侧面对康生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

## ◇ 陪同康生见毛岸青

1959年春天，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1届代表大会。我作为随团翻译一同前往。

这次会议期间，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分别住在两座楼内。周总理住一座，我随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栋楼里。这就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康生。

当时康生约摸60岁左右年纪，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镜，留八字胡，穿着一套由他本人设计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踏一双特制的皮鞋（他脚上有鸡眼，鞋垫上有凹孔来保护鸡眼不受磨擦）。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我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他让我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他还要我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带上。后来康生又对我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1936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毛泽东的亲人。

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后，我按照他的嘱咐，做了一些准备。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从外观上看，这座疗养院可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房屋高耸而庄严，大理石楼梯，房间很大。院长、医生等人在大楼门前等候，陪同我们走进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单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一会儿，岸青进来了，院长、医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剩下来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这时康生问：“你还认识我吗？”

“康伯伯，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随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30分钟左右，准备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江青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杨尚昆在回忆党的历史时，谈到30年代的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 ◇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我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的翻译。这是我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我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这是你们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因此我认为，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 排斥王稼祥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我叫去，先是让我们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我们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我们先后给他送过几批材料，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批

关于苏联农业中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但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对我说，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了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起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平，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平，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平，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把它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 ◇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他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我们翻译界的权威。我们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我设法将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 ◇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

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我在这里只举一个有关苏枚的案例，来说明康生的“迫害狂”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2002年年底，我因患重病肌无力症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结识了著名的王新德、郑剑晖等医学教授。王老曾多次给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护在毛主席病榻边参加抢救工作。

在同王老以及其他几位教授闲谈中，我获悉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王新德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脱了一劫。由此案可见康生这个“迫害狂”在文革中是如何草菅人命、为所欲为了！

~~~~~  
【人物春秋】

戚本禹沉浮录

• 霞 飞 •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1967年8月和1968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了18年有期徒刑。

◇ 少年得志，受到毛泽东赏识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年生。父母早年去上海谋生，戚本禹也就出生于上海。解放前，父母供他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读高中时，戚本禹很用功。受党的地下组织的影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1949年，戚本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戚本禹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认真，受到过多次表扬。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18级。

1958年，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住了戚本禹。那年3月，就全国来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整风因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在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林克、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为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就借反右运动批判这8个年轻干部，说他们“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是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为8个年轻干部说了话。毛泽东说：“想不到我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也使这8个年轻干部从心里感激毛泽东。1962年，戚本禹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又一次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受到的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3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戚反映的事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责令田家英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在中南海工作的戚本禹，知道毛泽东爱读历史书，就向毛泽东学习，留心去读历史方面的



书籍。一来二去，他对研究历史产生了兴趣。

在诸多历史课题中，戚本禹对中国近代史更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下了很大工夫，读近代史方面的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也试着写一些文章，投给一些学术刊物或者报纸。1963年，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史学界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就与罗展开了论战。这样，史学界的讨论风气更浓了。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大批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文章。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有地位的理论骨干担任，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1965年底，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署名姚文元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60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并没有积极响应，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现实政治斗争问题，隐晦地指出了中央高层中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 ◇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发表讨刘“檄文”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在中南海，田家英不仅呵护着戚本禹，还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替戚本禹说好话。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却取

代了田家英。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因在批判彭德怀、包产到户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又隔了几个月，田家英的问题被“升级”。1966年5月22日下午，中央的几位干部与戚本禹一同来到田家英的家里，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布了两条：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党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这样，戚本禹正式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在中南海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也描写了戚本禹当时的傲慢情形，他写道：“到了钓鱼台16号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了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鲁的印象。”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但并没想打倒刘少奇。然而，戚本禹因掌管中央秘书室，曾看到过毛泽东两次批判《清宫秘史》的谈话记录：一次是毛泽东1954年10月说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不是爱国主义影片；另一次是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因此，戚本禹决定，就从批判《清宫秘史》入手，发出讨刘“檄文”，打出一个政治信号，鼓动全党、全国人民打倒刘少奇。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3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3月31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5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1950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

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

紧接着，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刘少奇对造反派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抗议，对他们的诬蔑进行了批驳，但却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揪斗中，也有武斗行为。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

戚本禹在把眼睛盯上了中南海的同时，竟然忘乎所以地又瞄上了老革命家朱德。他们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朱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里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他看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后，气愤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全是一派胡言！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怒。

#### ◇ 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稳定一下混乱的局势。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更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并称为“小三”。之所以将他们并称为“小三”，不只是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而且因为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王力、关锋都比戚本禹年长，因此，戚本禹常称王力、关锋二人为兄长。现在，两个兄长倒了一双，戚本禹自然也心惊肉跳。虽然他在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王力、关锋，但他心中有数：离自己垮台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

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

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在批判王力、关锋时，把王力、关锋称为野心家，并把他们三个人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指挥下一起干的不少坏事，都往王力、关锋二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

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毛泽东8月26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说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接着，戚本禹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从这封信中明显可以看出，戚本禹还是想把问题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推，对自己则只说没有看出来王、关是坏人，要负部分责任。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9月7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事实上，在抓了王力、关锋之后，毛泽东此时已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当红卫兵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1967年12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此前，红卫兵小报对王力和关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涉及了戚本禹。现在，红卫兵小报对王、关批够了，开始集中火力批戚本禹了。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5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

#### ◇ 被“请假检讨”之后的戚本禹

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就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了。王力、关锋刚刚被“请假检讨”时，先是在钓鱼台2号楼被分别关押，后又转到西山的别墅分别关押。在这段时间里，王力、关锋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后来，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而戚本禹在“请假检讨”后，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因此，戚本禹并没有得到与王力、关锋刚刚“请假检讨”时一样的待遇。他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待遇一开始就不算好。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只是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人们又想起了“王、关、戚”。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于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

他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300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戚本禹被剥夺4年政治权利，则要到1990年初为止。戚本禹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据去过戚本禹办公室采访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记述：1988年他去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他肥瘦适中，身体不错，谈话时无拘无束。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他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这句话，是颇为意味深长的。

□ 《党史博览》2005. 7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